

段社會的變化可算是完成了。現今的漢語和中國思想可以說是在同時用小車和汽車載運汽油的階段。

漢語正在怎樣的變化呢？中國人的思想格式正在怎樣的變化呢？變化這個東西不能在他正在變化的時候來說明的，思想的變化尤其如此。語言的變化恐怕也是這樣的。我對於這件事不敢說什麼很肯定的話，特別的因為我不是語言學家，不過是一個學心理學的人對於語言和思想有相當的興趣罷了。所討論的問題非但是複雜的，並且是混亂的。讓我很膽大的說幾句外行話。

我以為現在是我們應當說話的時候。有幾種特別的勢力正在促進語言的變化。一是國語統一的運動。二是說話的西洋化。三是從事變以來，特別是在中國的中部，有大規模的民族的移動。假定這事變會延長，一定會產生語言變化的結果。

問題的兩方面

語言的變化，一方面關乎語音，又一方面關乎語句的構造。語音的變化純粹是語言學的問題，和心理學簡直是沒有多大關係。語言格式的變化，那不但是文法的問題，也是思想心理學所必須顧到的。我把問題的兩方面分別討論。

一 語音的變化

這一段話我不敢詳細的說，因為我對於語言學和中國音韻的歷史太不了解了。我的知識全都是零碎的，借了別人的。

甲、漢語的語音 漢語的基礎，到現在為止，還不能不說是建築在單音詞上的。並且那些單音的格式很容易說明。只須

問一個單音用什麼聲類開始，用什麼收聲結束，中間用什麼母音。不妨用北平話作一個例子，和別的方言比較。因為按照官樣文章，北平話是我們的國語。

(子)聲類 北平話的聲母，照注音符號是有二十一個。再加上娘母和影喻母，一共有二十三個。中國有好些地方沒有正齒的聲母(ㄗ、ㄘ、ㄗ、ㄝ)。有好些方言裏頭送氣的濁音很多，是北平話所沒有的。又有幾個地方還保存着幾個齶前音。

(丑)收聲 北平話只有兩個收聲，就是n和ng。語言學家大都承認中國語從前至少有六個收聲，三個是陽的m, n, ng, 三個是陰的, p, t, k。這些複雜的收聲，某種方言裏頭還保存着。據說p, t, k的收聲從前和b, d, g還有分別；粵語好像還保存這一點。大多數的方言裏可是只有北平話的兩個收聲。吳語並且有好些地方把n念做ng。四川話正是相反，有時候把ng念做n。

(寅)母音 北平話一共只有四十一個母音，連前面加上介母的和雙母音都算在裏頭，別種方言都比較要複雜一點。

乙、漢語的聲調 各種方言之中，北平話的聲調的輕重抑揚最為清楚。趙元任先生對我說，中國只有北平話的聲調和英語，德語相像。用北平話的聲調作白話詩，念起來可以和英文詩十分相像。用北平的調子說上海的‘洋涇白’，也可以得到很有趣的結果。北平的聲調是否只限於北平人用的，我可不敢說。天津話和北平話的分別，聽得很清楚，可是不一定在乎聲調。往南一過平津鐵路線，到了定興一帶，聲調就平下來了。

可見官定的國語，就是北平話，很有他的特別的地方，並且應用的區域不能算是很廣，簡直可以說是一塊大平原之中的

更加混亂，甚至於ng只用在a或o的後面，n只用在i和e的後面，也是可能的。沒有收聲的入聲（小舌阻）也許會影響到沒有收聲的北方音。

二 詞句結構的變化

這一方面也可以分兩層講，第一是詞的應用，第二是句子的格式。

甲、詞的應用，就是新詞的構造和舊詞的義意的變化。

(子)新詞的構造 漢語有一個時期很容易收納從‘四夷’傳來的新名詞，後來越變越死了。譬如‘羅卜’是外國話，漢朝人並沒有把他翻成‘洋山藥’。一千幾百年之後，外國又來了一種和羅卜相像的東西，中國人就管他叫‘胡羅卜’。最近又來了一種‘洋葫羅卜’。這個例子就可以說明中國話是越弄越死了。佛教帶來好些抽象的名詞，中國人原先沒有的，就按照他們的聲音翻譯。到了景教傳來的時候，中國人已經失掉了那一股野蠻的勁兒。天主教的翻譯名詞就變成很文雅的了。以後，恐怕非得有偉大的勢力不會打破中國人這種雅氣。最近的幾年和西洋的接觸來得猛烈一點。中國人的自信力不像從前那麼堅定。這在新名詞的構造上也是很容易看出來的。不妨隨便舉幾個例子：

‘法西斯’，‘蘇維埃’等等的名詞，要按照義意翻譯，並不比‘共和’，‘民主’之類更為困難。可是就沒有翻譯。這樣的名詞，用得久了，就不容易用別的有義意的翻譯來代替他。反過來說，翻錯了的名詞，用得久了，也不容易用一個按照聲音翻譯的名詞來代替他。梁起超的‘煙土波里仁’就沒有被人採用。還有

一類的例子是關乎日常的用的。假若同時有好些外國的東西運到了中國，一時連創造新名詞都來不及，於是乎不能不借用外國的名詞。其中最特別的就是喫西餐菜單子上的那一套。譬如‘布丁’，‘排’，‘三危子’之類，還沒有‘洋化’。‘咖啡’是譯的西文的café，北平人管他叫chiafei。北平人念‘可可糖’，照上海人的念法。其中轉變的情形可說是有幸有不幸。這些情形都代表中國話根本是守舊的，可是又不能不接受一點西洋的東西，彷彿是張之洞勸學篇的哲學。

有時候譯名的洋化也可以表現中國話在維新和守舊之間搖幌。譬如：‘冰激凌’容納了外國話的下一半。‘土豆兒’(pomme de terre)上半翻譯了西文下半的意義和聲音，下半翻譯了西文上半的義意。更有時候用從前的外國字來代替現在的外國字，譬如‘摩登’是從‘摩登伽’來的，反正都是侮辱女性。我們在這些瑣屑的例子，可以看出中國人接受外國名詞的時代已經過去了。越是思想清楚的人用名詞越是可以守舊。化學家，生物學家可以滿口講二十世紀的學理，然而他們的專門名詞可以是說文玉篇裏的骨董。

(丑)將來的普通官話的詞彙 提倡統一國語的先生們專門注意到讀音的問題，從沒有對於國語的詞彙和句法下過相當的工夫。說到詞彙，只見有人做了些常用字調查那一類的工作。他們所用的方法都是模倣美國人的，實在有點不合乎國情。

各種方言的詞彙不大相同，那是顯而易見的。那麼，所謂普通的官話應當用那一種的詞彙呢？還是用一種混合的詞彙呢？統一的困難，不在乎論理學上的所謂特殊名詞而在乎普通名詞。動詞的統一比別的詞類又格外的困難。統一動詞

的困難第一又不在于多音的動詞而在于單音的動詞。

這幾句話聽來像是有點武斷的。我原先也不知道北平話的動詞怎樣的難學，可是把詞彙仔細的分析了一下，就知道一個不在北方官話區生長的人，要學會北平的單音動詞，真是難極了。北平話的單音動詞，設若用漢字寫下來，至少要用一千三四百個字，其中有好些字又得代表兩三個意思。所以北平的單音動詞差不多有一千七百種不同的用法，不重要的分別還不算在裏頭。

一個南方人要學會北平的動詞，他的困難有好幾種。我現在從最不嚴重的說起。第一聲音的不同。譬如：‘加’字，北平人讀 chia，上海人讀 ka。可是聲音的變化大部份是可以按照語言學的公式來推求的。北平人用筷子夾東西，那個‘夾’字讀上平。‘夾在人中間’的‘夾’字讀下平。搯人脖子的‘搯’字是送氣的。吳語用筷子夾東西是 ka，夾在人中間是 ga，搯人的脖子是 k'a，都是入聲。這樣的例子很多。第二種的困難是同一個動詞而兩個地方的用法不同。

北平 倒水 對水 倒茶 斟酒

上海 倒水 倒茶 灑茶 灑酒

同是一件事，南方北方要是用全然不同的動詞代表，那倒沒有什麼。困難的中心點在乎同一個動詞而用法全然不同。

北平 人死了臭一塊地

上海 臭毛豆臭南瓜

北平 吃瓦片

上海 吃十方飯

這種困難之中的最困難的，還不是一個動詞在兩個地方用得

一個單音動詞，在一句短句裏的地位比較是自由的。‘我睡在地上’，‘我在地上睡’，這兩句句子的義意差不多完全相同。‘不要在桌子上寫’，‘不要寫在桌子上’，這兩句話的義意不同，可是都可以說。多音動詞的用法就比較要嚴格一點。我們只能說‘在院子裏遊戲’，‘在講台上演說’，斷乎不能說‘遊戲在院子裏’，‘演說在講台上’。漢語的多音動詞爲數不多。普通說話，有好些多音詞，像‘寫字’，‘吃飯’之類，他們的性質介乎單音詞和多音詞之間。他們在句子裏的地位也就比較有限制。‘我們在桌子上吃飯’，不能‘吃飯在桌子上’。可是現在我們正在創造真正的多音詞。‘思想’，‘考慮’，‘判斷’，‘辯論’之類的話，在稍微受過一點教育的人用的就很普通了。料想不到他們會把句子的格式改變過來。

讓我再舉一個例子。這一回說名詞的用法。漢語的句子裏頭凡是形容名詞的格式多攔在名詞的前面，不論那個名詞是句子的主詞還是賓詞。‘一隻餓得半死的狗吃了人家掉在地上的一條魚’。漢語的句子不能比這個說得更累贅的了。要是再長了一點，就不成一句話。普通的國語小說裏頭連這樣的句子都沒有。那是因爲形容的格式非得攔在名詞前面的緣故。我們不妨說漢語只能有短句，不能有長句。可是要接受西洋的思想，就不能不翻譯。西洋的句子可以長到不合情理的程度。A dog which has just escaped from a strongly built cage and is half starved feeds voraciously on a fish which due to carelessness was dropped on the ground by a man who just went by. 英文翻成中文，變成‘一隻剛從造得很堅固的籠子裏頭逃出來，並且餓得半死的狗使勁的吃一個剛走過的人不小心，掉在地上的一條魚。’現在的新

文藝作品裏頭就滿是這一類的糊塗句子。其中有好些還是全不懂西文的人寫的，那我就不知道他們是什麼心理了。德文的句子可以比英文長到四五倍，以至於十來倍，主詞在大西洋的那邊，動詞在太平洋的這邊。我覺得中國的句法非得要經過這一個很混亂的時期。其中最矛盾的現象就是不需要長句的地方有長句，而需要有長句的地方反而沒有長句。科學的思想，譬如生物學和論理學，有時候非得要用很複雜的句子才能表現出來，可是在譯文裏邊時常變成零零碎碎的短句子，甚至於把原文的真正義意取消了大部分。反過來說，小說戲劇那一類的作品，中國自有中國現成的句法，真不必勉強做效別人的。按照外國的情形，近代文藝的句子比科學的句子更近乎白話的句子。中國的白語文可不是這樣。所以我說這也許是過渡時期的混亂情形。漢語的句法，如果非得要變成複雜的，應當是爲要發表科學思想的緣故，不是爲翻譯西洋的文藝作品的緣故。我也覺得漢語的科學的句法將來會變成和西文十分相像。這也不過是隨便說說罷了。

上面所說的話已經牽涉到思想格式的範圍了。西洋近代科學的形式在說話上應用特種的句子表現出來。中國人學會了一點科學的知識，可是沒有學會科學的句子。我們沒有學會用漢語的句子來發表科學的思想。我說我們沒有學會，那還是把問題看得太簡單了。實在是無處可學。每一句話都得經過一番改造，可是自己又不是語言學家，文學家。科學家說洋話，簡直是勢所必然。說漢語得創造，說洋話只須摹仿就成了。然而遲早我們必得用漢語談科學。不單是科學，其他的勢

力也在督促我們改變語言的樣子。就是把大門關起來，國內的情形也一天一天的變複雜了。誰也不敢預言將來科學家會說那一套的話，他們所說的話又和一般人的白話有怎樣的分別。有人主張採用英文做第一外國語或是科學家的第二國語。又有人敢用唐宋八大家的格調寫成科學的文章，同時嘴裏說着一種不中不西不通文法的科學話；反正到了緊要關頭，中國話說不清楚了，還可以背外國書。這一類的法子都不在討論之例。因為我的基本立場是漢語所代表的思想格式會怎樣改變。

讓我把漢語或是書本上的中國思想最不合符現代化的幾點略略的說一說。我以為在最近的將來這些情形會大大的改變。

第一，漢語會變成更抽象，就是更和日常的社會環境脫離關係。這話好像和社會學的常識相反。其實並不如此。寫下來的語言會影響口頭的語言，這不但是外國的情形。中國兒童在課堂裏說話和在運動場上說話，句子的組織已經有好些不同的地方了。以往漢語只是面對面說的，因此說話的聲調，臉部表情，手勢，一般的背景，都可以幫助思想。思想的格式所以也帶着一點臉部表情，做手勢和感嘆命令的格式。我並不贊成有些外國人說的，漢語近乎姿勢語言 gesture language。他們的論據全然不對。可是我在另一方面發現漢語和表示情感，關係十分密切。例如：(一)否定的答詞常用輕重唇音起頭，從前也許全是重唇音。‘不’‘勿’‘否’‘非’‘反’‘悖’好像是和‘呸’‘屁’pooh, ba 屬于同一類的。(二)北平語的單音動詞和非動詞比較，送氣的多于不送氣的（送氣動詞和不送氣的比，多于送氣的非動詞和不

送氣的比。下面的話也是這樣的意思。) 上平聲和去聲的多于下平聲和上聲的。重唇的多于輕唇的。其他的方言裏有沒有這樣的分別,可惜我沒有材料可以統計。我也不敢說這是漢語的特點,因為我不知道外國語的內容。也許一切語言的工具都是以表情爲主要,達意爲次要。反正漢語的情感色彩相當的濃厚。這一類的情形似乎不是語言的‘科學化’所能影響。譬如句法的改變不會牽涉到動詞的送氣不送氣。可是有些很相像的情形現在已經在改變了。(三)例如漢語的假設句(hypothetical proposition)在日常語言裏用音調組成的時候多,用假設詞表現的時候反而少。北平的‘下等人’和孩子們不常說‘要是你來,我就去’,只說‘你來,我就去’,把‘來’的聲調改變一下。這樣的句子,寫下來有點不方便。五六歲的孩子在遊戲的時候不必說‘要是’,‘所以’,‘並且’之類的話;大人說了他們也懂;一談到書本上的知識,他們也會那一套。要把思想的格式整個的說出來,特別是寫下來,句子的格式也是會改變的。

第二,西洋下定義definition的格式也許會加入漢語。我因爲要明了中國人下定義的法子,曾經跟一位同學分析說文,爾雅,釋名那一類的書的義訓,覺得漢朝人,甚至于經學大師,心目中並沒有下定義那一個問題。說文的注解,比較的還近乎現代西洋人之所謂邏輯的,只有像下面的例子:

玠,大圭也。

溝,水瀆,廣四尺,深四尺。

下面的例子,用現代的眼光看來,就很特別了。

簾,堂簾也。

松,木也。

邦,國也。國,邦也。

天,顛也。

我們不能說中國人不會下定義,他們就不明了世界上何以有這個需要。一個幼稚園的小學生已經知道‘狗有四條腿,然而有四條腿的不一定是狗。’反而言之,大學生要是不經過特殊訓練,也不會留意定義。有一次我在大考的時候出了一道題,大意是‘×是什麼,有幾種?’結果全班十來個人差不多全能回答×有幾種,沒有一個知道×是什麼。真的不知道麼?不然。他們就沒有記那一句話是怎樣說的。日常生活上定義的用處很有限。西洋人也只有哲學家,數學家,和科學家才對於這一種句子的格式咬文嚼字。我們不必詳細討論定義和西洋文化的關係,反正中國人要接受西洋文化,至少一個定義非得要會說的。自己要創造所謂新的東方文化,也免不了要把思想的基礎論據說得明白。像孟子,王陽明那一類的哲學書,我們只能迷迷糊糊的欣賞,無從加以批評。說得再淺近一點,我們中間研究語言文字的人怕沒有不念過劉淇助字說略,王引之經傳釋詞那一類書的。試問劉淇的助字是怎樣的字? 王引之的詞是什麼詞? 你就查遍了書,也得不到結果。我所以舉這兩本書做例子,因為這兩位先生說話很有條理,是中國小學家之中的頭等人物。我的意見,以為中國人並非沒有下定義的能力。因為沒有那種需要,科舉時代更沒有那種風氣,所以不必受那樣的訓練。我不必說中國人應當不應當學說那一套的話。中國人實在已經在那兒學這一套了。至于漢語定義的格式會不會和西洋一個樣子,那倒是小問題。

第三,我們漸漸的會把事實的因果和詩詞的興比分開,把

對事實的論據和對人的反辯分開，把科學的是非和德道的應當不應當分開。這三件事也許就是一件事，就是因果的不清楚，就是真美善在思想上混在一起。我並非主張人生有什麼獨立的真，和美，和善。然而真有真的條件，美有美的條件，善有善的條件。真的條件，凡是日常生活所遇見的，都是可以用話來說清楚的，並且不必連帶美的和善的條件。這一方面的思想的變化，關乎思想的內容的成分居多，不必在這兒討論。我可以在說話的形式方面舉一兩個例子。中國式的文章，表面上最能代表因果的關係的，要算‘演聯珠’的格式。這個格式好像是陸機發明的。劉伯溫之後，少有人模倣了。我曾經把昭明文選和誠意伯集的好些例子略略的分析一下，就發現一種可笑的情形。凡是句子裏用‘是以’之類的地方，把上句和下句顛倒一下，反因為果，反果為因，文章的氣勢還是很順利，還是同樣的通或是同樣的不通。換句話說，‘演聯珠’的格式裏無所謂前提和結論，無所謂演繹和歸納，無所謂推論，反正是從甲扯到乙，從乙扯到丙，從丙扯到甲，無往而不亨通。這是純粹的因果說不清楚。下面的一個例子可以表示中國人凡是遇見因果的理論和道德的觀念發生衝突的時候，會怎樣對付他。顏氏家訓省事篇（卷五第十二）說：

‘曆象之要，可以晷景測之。今驗其分至薄蝕，則四分疏而減分密。疏者則稱政令有寬猛，運行致益縮，非算之失也。密者則云日月有遲速，以術求之，預知其度，無災祥也。用疏則藏姦而不信，用密則任數而違經’。

那怎樣辦呢？顏之推可不是碰到了一個很好的思想的機會了麼？

‘議官所知，不能精於訟者。以淺裁深，安有肯服。既非格令所司，幸勿當也。舉曹貴賤咸以爲然。有一禮官恥爲此讓，苦欲留連，強加考覈。機杼旣薄，無以測量。還復採訪訟人，窺望長短。朝夕聚議，寒暑煩勞。背春涉冬，竟無予奪。怨誚滋生，激然而退，終爲內史所迫。此好名之辱也’。

中國人往往有了問題，不讓他成爲問題。‘幸勿當也，……咸以爲然’，就是詩經裏的‘尙寐無覺’，‘尙寐無聰’。這樣的文章格句在思想科學化的時代不會發生。用這樣的標準來讀宋明語錄，也許會發現中國思想的基本困難。數學和實驗科學根本不是這種形式的。這兒所說的，不單關乎句子的格式，也不只是說話的佈局。在本題範圍之內不便再說下去了。

社 會 學 界

第 一 卷 目 錄

社會學在中國方面的幾個重要問題研究舉例	梁任公
中國之社會倫理	馮友蘭
中國民族之研究	王桐齡
中外文化接觸之研究	劉 強
中國社會調查運動	李景漢
國內重要工會之概況	陳 達
介紹衛中先生學說	梁漱冥
周易中之社會哲學	常乃惠
中國晚近社會思想之變遷	俞頌華
歷代刑律之概略	王文豹
中國歷史上的幾個安那其主義者	邊燮清
社會個案服務之研究與中國	于恩德
中國衛生芻議	黃子方
現行婚制之錯誤及男女關係之將來	計地山
日本之社會學界	李劍華
社會學界消息	
錄附——燕大社會學會及其工作	
編輯者言	

* 定 價 四 角 *

社會學界

第二卷目錄

定價八角

社會生活的理化基礎	許世廉
文化失調與中國社會問題	孫本文
北京犯罪之社會分析	嚴景耀
北京司法部犯罪統計的分析	張鏡予
成府人口調查	房福安
中國民族之研究	于桐齡
鄉村社會心理之分析	馮鏡
閩謠選解	劉強
南京商店招牌用字	陸志章
戲劇與社會	熊佛西
關於衛生行政之研究	金寶善
幾個中國農佃制度舉例	葉鵬年
中國社會學界消息	

第三卷目錄

定價一元

北京最低限度的生活程度的討論	李景漢
幾個社會學者所用的方法	吳景超
中國監獄問題	嚴景耀
農村信用合作社的起源及其發展	張鏡予
北平的公共衛生	余協中
社會生活的生物基礎	許仕廉
兩漢社會狀況的鳥瞰	瞿兌之
中國女子對於婚姻的態度之研究	陳利蘭
燕大工人生活調查	宋思明
建設時期中教授社會學的方針及步驟	許仕廉
地位關係對於社會發展的影響	孫本文
鄉村社會學新解	楊開道
社會距離	言榮彰
德國社會學簡論	梅貽寶
現代社會學	張世文
犯罪學書目(中英文)	嚴景耀
燕京大學社會學系一九二八秋季消息	
國立中央大學文學院社會學系概況	
滬江大學社會學系情形	
廈門大學社會學系消息	

CHANGES THAT ARE TAKING PLACE IN THE CHINESE LANGUAGE AND CHINESE THOUGHT FORMS.

In this lecture phonetic changes are only slightly dealt with. Changes in thought forms are discussed as they appear in linguistic forms.

As to phonetic changes, it is the author's guess that the coming National Language based upon Peiping Mandarin will have the strong accents flattened out and the supradental initials modified. It is possible there will be further confusion in the use of ending consonants.

As to vocabulary, the transliteration of foreign words will not play an important role. Polysyllabic verbs will increase in number.

The last mentioned point will by itself produce significant changes in syntax. In addition, the introduction of Western concepts and methods will perhaps necessitate the creation of new linguistic forms probably patterned on Western scientific language.

In its more far-reaching aspects the language of the learned will express more clearly the ideas of causality and contingency mainly by making explicit the usually "missing" conjunction. Truth, morality, and appreciation will be differentiated.

C. W. Lath